

聯共黨史

(下冊)

下 冊 目 次

反動時期的黨 1—26

六月三日以後統治的社會經濟實質 1

政府的反革命及社會的反動 5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路綫與組織路綫，這一時期黨

的中心會議 8

孟塞維克取消派以及布爾塞維克對於他們的鬥爭 10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全俄黨的代表會議 11

召回派和哀的美敦書派是取消派的內應 13

一九〇九年六月『無產者報』編輯部的擴大會議 15

『左』的取消派聯合爲前進派 17

反對託洛茨基中派主義立場的鬥爭，反對布爾塞

維克中調和派的鬥爭 19

一九〇一年一月中央全體會議 21

布爾塞維克同孟塞維克黨派的同盟 23

在新的革命高漲時期中的黨 27—57

新的革命高漲的開始 27

一九一二年四月四日連那流域慘案	28
爲羣衆的工人組織而鬥爭	30
黨的『星報』的作用	31
『思想』和『教育』雜誌	32
布爾塞維克的『真理報』和『我們之路』	33
一九一二年布拉格黨代表會議及其在黨史中的 意義	35
一九一三年黨的會議。克拉可夫和波洛寧會議	39
託洛茨基派、取消派的八月聯盟	43
國會黨團的工作	46
保險運動	48
在兩個革命中間國際舞台上的布爾塞維主義	50

帝國主義世界大戰。對於戰爭的估計 以及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59—76

帝國主義與世界大戰的原因	59
第二國際的崩潰	62
對於社會國家主義派的鬥爭	65
中間派是掩蓋的國家主義者	66
布爾塞維克對戰爭的態度	69
關於民族自決的口號與黨裏『左傾』分子的立場	72
布爾塞維克關於解除軍備口號的意見	75

帝國主義大戰時期黨的工作 77—95

對於國會內布爾塞維克黨團的審判	77
爲第三國際而鬥爭。齊米瓦爾德和金泰爾的代表	

大會	79
大戰中俄國黨的組織和黨的工作狀況	83
大戰時俄國的工人運動	87
二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91

一九一七年二月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及布爾塞維克把它轉變爲社會主 義革命的鬥爭 97—122

二月革命中資產階級的領導權及黨的作用	97
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及臨時政府，兩重政權及其 社會根源	103
一九一七年四月四日列寧的提綱	110
一九一七年四月黨的第七次代表會議。對於機會 主義者的鬥爭	115
四月代表會議論土地問題及民衆問題	121

偉大無產階級革命之準備與資產階級 政權之被推翻 123—166

羣衆革命動員的時期	123
一九一七年四月二十日和二十一日示威	127
混合政府。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六月十八日 的示威。克倫斯基的進攻。布爾塞維克爲爭 取軍隊中的影響而鬥爭	129
一九一七年七月三日—五日的事變。黨是羣衆 的領袖	134

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三日黨第六次代

表大會。斯達林同志在大會上的作用	138
區域聯合派與託洛茨基	144
一九一七年八月十二日的國事會議	146
可尼洛夫的暴動	148
一九一七年九月至十月，組織暴動的時期	152
民治會議、國會預備會及布爾塞維克的策略	155
武裝暴動的準備。卡米尼夫和徐諾維夫的工賊行 爲之揭發	157
暴動的組織與執行	160

附錄（一）..... 167—265

關於布爾塞維主義歷史中的幾個問題	169
用布爾塞維克的精神研究黨史	181
布爾塞維克黨的三十年	203
論聯共黨史課本	226
怎樣研究聯共黨史	229
聯共黨史研究提綱	232

附錄（二）..... 267—283

蘇聯共產黨（布）黨章	269
------------------	-----

附：正誤表..... 末頁

第九章

反動時期的黨，一九

〇七——一九一〇年

革命的政黨必須學習，他們學習了怎樣進攻。但現在還需要懂得怎樣正確的退却的科學，以作進攻之補充。他們須懂得——革命的階級已經在自己痛苦的經驗中懂得了——如果不學會正確的進攻和正確的退却，就不能期望勝利。

——列寧：『左派幼稚病』

六月三日以後統治 的社會經濟實質

第二次國會於一九〇七年六月三號被沙皇政府命令解散，這一天，在俄國歷史上成為政舉的一天。因為沙皇政府沒有得到人民代表的同意就發表了新的國會選舉的命令。這樣，沙皇政府就完全拋棄了

自己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十七號所發表的宣言，根據這一宣言，沙皇政府在發表新的法令時是應得到國會同意的。可是，事情並不限於國會的解散；這一「國會」的社會民主黨黨團，被送交法庭審判；工人階級的代表，或是被罰處苦工，或是被判流放。新的選舉法，是在於加強國會內（以及國內）土地所有者地主及工商資產階級的影響，減少國會內工農代表的數量。有些居住被壓迫民族的邊區，在第二次國會中是派遣了革命的代表；這些邊區，或是完全被剝奪了選舉權，或是被限制了選舉權。根據新的選舉法，工人被派遣到第三國會的代表比第二次國會要少四倍；根據沙皇的法令，工人只能按照工人區，在六個省裏（彼得堡、莫斯科、哈爾可夫、也柯太林諾斯拉夫、帕拉金米耳、考司拖勞夫）每省選舉一個代表。選舉的制度是這樣的：大工廠的工人、在該工廠做了六個月以上、年齡在二十五歲以上、繳納居住稅的、選舉了代表；這些代表選舉選舉者，選舉者再按照以上省份選舉一個議員到國會去。除工人區以外，社會民主黨只能利用人民中小資產階級階層的選舉票，被選到國會去。（在高加索某些地方，個別孟塞維克就這樣被選到國會上去）沙皇政府，一方面迎合貴族地主的要求，他方面迎合工商資產階級的要求，在勞動立法及土地改良上的好些步驟，把沙皇制度和自由的、帝制的資產階級溶合起來了。

沙皇的帝制，用列寧的話來說，是『在轉為資產階級帝制政體的路上又進了一步』。這就是說，沙皇政府在一九〇五年十月和資產階級成立了妥協，同時繼續代表着農奴主的利益。在新的條件之下，他就在農村中保護着兩個階級的利益：一方面是逐漸加強的鄉村資產階級；他方面是大的土地所有者及地主；沙皇政府就在他們中間縱橫徘徊着，同時又負擔了鎮壓工農新的革命行動的任務。沙皇政府在農村中、在黑色百人團的地主與富農中間的縱橫徘徊的情形，列寧稱之為『農村的拿破崙主義』。這就是說，沙皇政府『失去了自己舊的宗法社會的和封建的簡單的團結的基礎』，而在開始資產階級化之後，喪失了以前的穩定性。

自由資產階級也迎合了政府，資產階級的行動明顯的表示出他的唯一要求在於防止革命、在於阻礙革命運動往前發展。經過第三國會所通過的好些法令，資產階級鞏固了自己對於國家機關的影響，對於地主專制國家的影響。由於國會中地主的幫助，資產階級把勞動立法轉為反對工人的法令，例如他把關於商業雇員休息的法令轉為反對商業雇員休息的法令。資產階級一般的承認商業雇員一天應作十二點鐘的工，有些甚至達到十五點鐘。資產階級提出了戰爭性的口號：『偉大的俄羅斯！』，正是從這時候起；在資產階級報紙上，在沙皇政府政策上，對於近東的民族加緊搖幌着武器，正是從這時候起。俄國民族自由主義者的政策，開始準備帝國主義戰事的條件，正是立憲民主黨準備了輿論，提出必須在軍事上注意達達尼爾海峽與近東的主張。

工業的低落也促進了反動的情緒。工業的低落已經在第一次革命的前夜開始了；在一九〇六、〇七年份高漲之後，工業繼續低落。直到一九〇九年末一九一〇年初，工業的低落使得工人階級生活狀況空前惡化，資本在各個戰綫上進攻，職工會組織被搗毀，罷工運動低落下來。按件工資低落了，罰款加重了，發生了許多關廠以及大批失業。同時，在農村經濟、特別在農民經濟方面却發生某些高漲；促成這種高漲的，是一九〇八——〇九年的豐收以及下述情形：就是在第一次革命中，農民運動使得地主加緊把土地出賣，使得地主土地部份的轉入富裕富民手中，使得佃價減低；在這時候，糧食的收穫量是增加了。如果在一九〇七——一九一〇年，每一個海可脫土地能收穫七、三眞特奈耳糧食的話，那麼，一九一一——一五年每一海可脫已增至八個眞特奈爾了。

政府清楚的知道，光是依靠貴族與工商資產階級是不够的。他企圖使富裕農民成為自己的鞏固基礎，企圖造成堅強的富農。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日的法令，說明農民有權脫離公社、成立獨立經濟、分割土地、把土地鞏固為自己私人財產的這種權利。這一法令，是應當為着完成上述的任務的。沙皇政府，在長時期內保存公社，作為一種貢

款的賦稅的警察組織；現在却幫助農民中的富裕者脫離公社。當然，比較富裕的、富農的上層農村分子，就利用了這一法令。他們努力保存自己的大的分地，不僅購買地主土地，而且購買貧農的分地來增加自己地產。政府促進了這一過程，可是這種辦法是更加加緊了農民的分化。從一九〇六年十一月九號發表的時候起一直到一九一五年五月一號，在全體農家中，差不多五分之一或是差不多兩百萬的農家，把全體農民土地中的百分之十六固定為自己的財產。應當指出，在富農加緊脫離公社組織獨立田莊的幾年，（一九〇七到一九〇九）農民運動開始往下低落；但是不久，在一九一一年，由於公社社員和獨立田莊主人的沖突，使得農民運動又有了某些增長。這個農民運動，現在所表現的，除反對地主的鬥爭以外，還發生焚燒獨立農莊的富農的房子、割除他們的糧食草料的事情。

沙皇政府土地政策新的改變的實質，就在於地主及資產階級已經覺到了破壞公社、破壞舊的分地所有權的必要。這種破壞成為不可避免的了。列寧在一九〇八年三月寫道：『資本主義已經一往不同的破壞了俄羅斯舊的農村結構的一切基礎，但是，這一結構的破壞，可以按照地主方法或是按照農民方法來進行：可以為着地主資本主義肅清道路；或是為着農民資本主義肅清道路。地主式的對於舊制度的破壞，就是強迫的破壞公社，加緊的使得貧窮的農家破產及毀滅，使少數富農得到利益；農民式的破壞，是在於沒收地主的土地所有。』（見列寧：『新的土地政策』）很顯然的，我們的黨，從這兩種『破壞舊制度的』可能道路中，選擇了『農民式』破壞的道路，即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農民暴動的道路。一九〇八年二月十三日，沙皇接見了第三國會的三百零七個議員，沙皇聲明他不準許暴力的奪取地主土地。關於這點，列寧如下寫道：『農奴主的沙皇，向非黨的農村大聲的說，他不準許強迫的奪取土地。但是工人階級為着回答沙皇起見，向千百萬非黨的農民大聲說道：無產階級號召農民來進行羣衆的鬥爭，來推翻沙皇政府並沒收地主土地。』（見列寧：『新的土地政策』）

在斯托理賓的改良下，農民是否喪失了自己的革命性呢？沒有。相反的，在國會裏面以及國會之外，沙皇政體的土地政策以及他的一般政策之趨向拿破崙主義的轉變，只有使得這兩方面中間、即一方面黑色百人團的專制政體及『野蠻地主』的統治、他方面全國經濟的社會發展的需要之間的沖突，更加尖銳起來、擴大起來。警察富農對於農村羣衆的進攻，增長了農村中的鬥爭，使得這一鬥爭在政治上更加覺悟。可以說，使得反對專制政體的鬥爭和每個農村的日常切身問題接近起來。（見列寧：『對於當前時機的估計』）

政府的反革命及社會的反動

在解散第二國會並摧殘社會民主黨黨團之後，政府就更加殘酷的來摧殘工人階級的政治與經濟的組織了。因為解散國會沒有引起嚴重的羣衆的抗議，使得政府可以放手做事，因此，政府就更容易來鎮壓工人階級的組織了。政府不僅把社會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判處苦工和流放，而且使大批革命者擠滿了苦工的監獄、堡寨及流放地點。黑暗的恐怖，瘋狂地散佈着，絞手斯^托理賓把絞架佈滿了全國。

工人階級及農民運動的失敗，使得第一次革命的同路人中間發生破裂和分化。在智識分子中間，這種破裂和分化特別的深刻。在革命最大高漲的時期，從資產階級陣營中來加入革命政黨的那些人，到了償付代價、鎮壓革命的時候一來，便脫離了革命政黨。他們寧願實行適應斯托理賓統治的策略，而不願冒繼續鬥爭的危險。他們中間，一部份轉入革命的公開敵人的營壘，一部份坐在遺留下來的公開的團體裏面，並且經過出版物企圖以蛻化到斯托理賓制度去的精神、經過取消革命鬥爭形式與方法的道路來影響無產階級。

從來沒有像這幾年那樣多的內奸與叛變。沙皇的偵探和憲兵，利用了悲觀失望的情緒，從革命政黨的黨員中吸收某些叛徒，這些叛徒甚至侵入了中央領導機關。例如在我們黨的中央，混入了內奸馬利諾

夫斯基，在真理報的編輯部混入了切爾諾馬索夫；在社會革命黨的中央坐着內奸阿塞夫；他把社會革命黨軍事組織的一切計劃都報告了政府（很可注意的，就是當阿塞夫被揭發的時候，切爾諾夫以及其他社會革命黨的『戰鬥人員』，却使他能够安穩的逃去）。

在第一次革命中，出版光輝的革命著作之文學，也開始深刻的墜落下去。在文壇上出現了整羣的作家，他們開始歌頌色情文學與性的淫亂。

所有這些醜惡的與墜落的現象，是在大批失業、大批驅逐工人、關廠、破壞工會以及其他工人組織等等條件之下發展起來的。在一九〇七年封閉了一百五十九個職工會；在一九〇八年封閉了十個；一九〇九年封閉了九十六個；一九一〇年封閉了八十八個；職工會不能不轉入秘密狀況。從一九〇七年到一九一〇年，拒絕了六百零四個職工會的登記；在革命高漲時期，職工會的會員有好幾十萬，到這時候就減低到只有三萬五千了；在一九一〇年，敖得薩、伊凡諾夫、窩司尼奧斯克及其他城市，職工會完全被摧毀了；在耶克太林諾司拉夫以前有五十一個職工會的，到一九一〇年只剩了九個了；在莫斯科，一九〇九年三月一日有三十二個職工會，四萬二千會員，到同年夏天，就只有二十個職工會七千會員了。資本的進攻，向着各方面進行着。按件工資在一九〇八年已經減少了百分之十至十五，工作時間到處延長到十小時到十四小時。工作時間的延長和工資的減少並行前進；罰款的制度又重興起來；工人活動的任何表現被殘酷鎮壓，不但職工會被封閉，而且職工會領導機關人員到處被逮捕、被流放。只在一九〇七年一年，就封閉了一百個以上的職工會的報紙；在產業中，大批驅逐工人，首先就將先進的工人驅逐於廠門之外。

所有這些事實，影響於無產階級的同路人的墜落；就是在我們黨的內部，這些事實也引起部份黨員的墜落。第一次革命的失敗、工人農民運動之受摧殘、工農運動之被破壞、一大部份智識分子的脫離、資產階級帝制政體的暫時穩定、所有這些，影響了我們黨內個別集團

的動搖。因為我們的黨，在那時還不是包括純粹的成份的。脫離我們黨的智識分子是很多的，莫斯科委員會在一九〇八年十月十六號的通知中，指出了『智識分子可恥的從黨逃開』。在一九一一年末，列寧寫道：『經過四年破壞與分裂之後，建立起：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中心。』再後一些時候，在一九一二年一月黨的拍拉格會議的決議案上說到反動時期引起『大部份黨的組織的被毀與破壞，在多年內沒有黨的實際中心——中央委員會』。在對於第二國際社會主義同盟的報告中，列寧寫道：

『在最近幾年，對於俄國社會民主工黨，是動搖的破裂的幾年。在三年之中，黨沒有能够召集代表會議；在最近兩年以來，中央不能開展任何的行動。』

可是雖然在這樣困難的條件之下，布爾塞維克黨却還是保持了自己原則上的明確的黨的路綫，這個就證明了布爾塞維克的力量。在一九二〇年當列寧回憶這一時期的時候，他寫道：

『在這次被打敗的反對黨和革命黨中，布爾塞維克黨最退得旗幟不紊，其「軍隊」之喪失最少，主力之保存最多，分裂最微（就其深禍與不可救藥而言），頹喪最輕，大規模的、正確而果毅的恢復工作之能力最大。』

布爾塞維克為什麼能够達到這點呢？『布爾塞維克黨之所以能如此，在其能够無情的揭破並逐出一般口頭革命家。這裏人不願了解退却的必要與怎樣退却。他們不了解在最反動的議會中，最反動的職工會中，協作社以及保險會等等組織之學習公開工作的必要。』（以上俱見列寧：『左傾幼稚病』）

布爾塞維克之所以能够達到這點，同樣也是因為能够徹底揭破那時的右的機會主義者——取消派孟塞維克、以及『左』的機會主義者召回派、抵制派的前進派等。

布爾塞維克的策略路綫與組織路綫，這一時期黨的中心的會議

我們已經提到了第二國會被解散以後所立即召集的我們黨的第三次代表會議（一九〇七年七月）。在這一會議上，討論了關於參加國會議選舉的問題。我們已經看到，那時領導的是一九〇七年倫敦的第五次代表大會所選舉出來的中央，參加中央委員會的布爾塞維克，有列寧、都布魯文斯基、高而登堡、麥西考夫斯基、盧世可夫、奇奧道勞維支、諾金、馬拉提及其他；孟塞維克有馬丁諾夫、秀兒丹尼亞、尼幾佛兒、伊索夫、馬爾託夫及其他；波蘭社會民主黨有端爾新斯基、瓦耳斯基，他們的候補人有馬哈列夫斯基、馬列斯基、鉄虛哥；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有丹尼雪夫斯基，候補人有布雪維茲秀兒茲；以後中央委員會中又提進了三個人，兩個是猶太工人同盟的羅森及麥傑姆；一個是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克拉木斯克龍堡。

這一中央是非常不堅定的，他沒有堅定的政治路綫。猶太工人同盟代表常和孟塞維克一起，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是動搖的騎牆派。因為如此，在倫敦大會上已經形成自己組織的布爾塞維克，就不能不繼續保留自己組織的中心，以便在中央內部堅持布爾塞維克的路綫。

在第一次國會議選舉之後，在一九〇七年十一月召集了第四次全俄黨的代表會議。參加這一會議的有十個布爾塞維克，四個孟塞維克，五個猶太工人代表，五個波蘭社會民主黨人，三個拉脫維亞社會民主黨人。在會議上，可以明白看到，布爾塞維克的秘密組織是保存得最多，這種情形加強了整個布爾塞維克的組織在社會民主黨中的影響。這一代表會議，通過了關於國會中社會民主黨黨團策略的布爾塞維

克的決議，這次議案說明：無論以何種形式都不能幫助立憲民主黨；因為，立憲民主黨人事實上和反動的十月黨人一齊投票，他們不僅把自己形容成爲反對派，而且把自己形容成爲民主派的代表。在決議案說明：國會黨團的最重要的工作，應該是向廣大民衆說明第三國會對於人民利益的完全違背，揭破政府的自由派的提議的階級實質，把社會民主黨最低限度綱領的要求不加任何削減與他們的要求對立起來，同時應當特別注意那些關係廣大民衆經濟利益的問題。這次議指出：在某些場合，可以和比較立憲民主黨人爲左的集團成立妥協，但同時不許在社會民主黨綱領及策略上有任何的退讓，也不需要同他們成立某種聯盟。黨之所以不能不通過這一決定，是爲着防止國會黨團蜕化的可能，防止國會黨團蜕化成爲完全脫離黨的領導機關而獨立行動的集團之可能。在西歐國會的實際經驗中，常時發生這種情形，就是國會中的社會黨員完全脫離自己的黨及自己選舉人而獨立行動，並且事實上常是迎合資產階級的國會政黨；他們不向工人階級作報告，也不向他們負責。在我們決議中，指出國會黨團必須服從中央委員會。決議並且提出了如何以革命方法利用國會講台的任務。社會民主黨的議員，進到國會裏去不是爲着『創造的工作』，而是爲着利用國的講台來進行革命的鼓動，並且把勞動民衆團結到工人政黨黨綱的不折不扣的要求上來。

關於個別的社會民主黨人（例如蒲列哈諾夫）參加資產階級報章的問題，代表會議在特別的『關於參加資產階級報章』的決議案中指出：『社會民主黨人參加自由派及自由民主派報章，在現在是帶着這樣的性質，就是他能給工人政黨以嚴重的損害；如果，這種參加往前繼續下去，那麼能夠引起社會民主工黨的嚴重的思想上與組織上的墮落。』

在這一代表會議上同樣通過了『關於小組組織中心及鞏固中央與地方組織聯系』的決議。事實上，在各地方那時不僅保留了特殊的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的中心（委員會），而且在許多孟塞維克佔統治地

位的地方，孟塞維克非但不給布爾塞維克以任何工作，而且不讓他們接近黨的秘密組織。在孟塞維克佔據統治地位的組織裏，布爾塞維克從沒有減弱過揭破他們錯誤的工作。此外又通過了決定，要立即開始出版黨的中央機關報。

一九〇七年末，全俄代表會議所通過的決定，更要求布爾塞維克向黨內及黨外的一切機會主義的派別與傾向進行不調和的鬥爭。我們已經看到，在這時候已經生了各種機會主義的派別，從右來的取消派以及從『左』來的取消派。布爾塞維克列寧派對於這些孟塞維克取消派及『左』的取消派的各集團的鬥爭，是我們黨在這幾年（不僅在反動時期而且在新的革命高漲的幾年）的工作內容。這種鬥爭不僅進行於國外的領導中心，而且進行於俄國的黨的地方組織。

孟塞維克取消派以及布爾 塞維克對於他們的鬥爭

社會民主黨內的分歧，在第一次革命失敗後是更加厲害了。一部份孟塞維克，認為無產階級的失敗是證實他們觀點的正確，就是無產階級不能成為當前革命的領導者。同時，他們認為這一革命已經完結了。孟塞維克中間，大部份開始宣傳必須取消秘密工作與秘密組織，孟塞維克取消派提出要適應於沙皇的斯托理賓的統治，只在沙皇法律所容許的合法範圍內進行活動。為着這點，須減削我們的綱領和我們的口號，不要提出我們基本的革命要求，而提出部份改良及修改現有立法的打了折扣的要求，因此，他們得到了『斯托理賓的工黨』的別號。在倫敦第五次代表大會以前，他們已經提議要建立『廣大的』、『公開的』工人政黨，實際上這一種『廣大的』政黨，完全不是革命行動的政黨，而祇是機會主義者的政黨罷了。

那時在俄國公開發行的雜誌『我們曙光』、『復活』和『生活事

業』等上面，孟塞維克取消派開始公開的宣傳，說我們當前不是向着革命危機而是向着憲法危機。說，迎接了這一危機，工人階級有完全的可能去從昇到政權地位的資產階級手裏獲取部份的讓步，以便能夠擴大自己鬥爭的範圍并增加組織的可能。孟塞維克取消派聲明斯托理賓的改良是已經實現了，聲明俄國已有『文化的資本主義』，社會民主工黨應當適應於它。這些孟塞維克取消派，如拉林、耶小夫、賴維斯基、波特列索夫等，確定的說，那時社會民主黨已經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取消，因為秘密組織是沒有了；如果要把他恢復起來的話，那麼『真正的人士是不會走向地下的』。孟塞維克馬爾托夫聲明『秘密政黨現在沒有政治的任務』，而認為特別地從事於取消這些外表，是一種沒有意思的事情。

是的，馬爾托夫和但茵加入了『社會民主黨人』報的統一的編輯部，並且有時裝腔做樣，好像他們是在批評取消派。可是在事實上，他們自己正是取消派，並且對黨的工作怠工。這樣我們可以看到，孟塞維克是要建立一個新的合法的『斯托理賓的工黨』，這種黨，是與無產階級革命的政黨沒有絲毫相同之點的，他們正是向着這一方面進行工作。

列寧在許多文章上、斯達林在『高加索來信』上、都揭破了取消派，指出取消派是放棄社會民主黨綱領、放棄革命策略并取消秘密政黨的。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 全俄黨的代表會議

一九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一至二十七日，在巴黎經過很大的困難召集了第五次全俄黨的代表會議，出席這個會議的有列寧、達拉都太、波力達耶夫、以及從中央工業區、彼得堡、烏拉爾來的五個布爾塞維